

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日子

江 泽 民

(全国政协委员, 一机部顾问)

出国前的准备

我(原名江克明)老家在四川省江津吴滩场,这也是聂荣臻同志的故乡。我们的童年都是在这个贫苦的农村度过的,并在同一个初小念过书。后来,由于家境贫寒,我进了重庆平儿院。

一九一八年底,我在重庆平儿院毕业了,正在徘徊于今后的前程时,恰巧得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去参加考试。由于它的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而我却只是高小毕业,没有考上。但是,因为我在平儿院学习成绩不错,连续三年保持了同年级考试的第一名,受到院创办人扬希仲的器重,扬希仲曾募捐巨款资助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时,他便出面保送我进了这所学校。

预备学校设在重庆市内一座夫子祠里,教室简陋,设备很差。学校的组织比较松懈,学生们上课来,下课走,没有宿舍和体育场地。学生主要学习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等几门课程,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常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准备。邓小平同志稍晚时间也进入这所预备学校,他显得非常精神,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

不多，学习非常刻苦认真。入学不久，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重庆各学校立即响应，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浪潮。我们预备学校的同学，为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曾经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得到初步结果。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又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摔在地下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也不用东洋劣货。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我们于一九二〇年夏天毕业了。随后，又经过考试，我和其他一百多位同学都被录取为公费生。这些同学中有邓希贤（邓小平）、邓绍圣（邓小平同志的叔父）、周维桢、冉钧、胡大智、阚时杰、王若愚、熊禹九、刘君才、张熙、李植、贾岱、熊正钧、熊正心、刘深山等。从中国到法国的经费，全部由开明士绅所募集的捐款中供给，这就给我们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中的一个大问题。

远涉重洋到法国

一九二〇年九月初，我们从重庆出发，乘船从长江东下，到了上海后，经华法教育会办理了手续，一个礼拜后，便乘坐法国邮船“昂得莱蓬”号，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

旅途中的经历，条件十分艰苦。我记得，那条邮船上的一等舱是八百元一张票，二等舱是五百元一张票，三等舱是三百元一张票，我们花了一百元买了四等舱（即无等舱）船票，本来没有什么四等舱的，只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穷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是货舱，里边半明半暗堆放着各种货物，没有什么设备，我们就住在重叠的多层床铺上。舱

内空气非常恶劣，臭虫又多，蚊子咬得很厉害，许多人只得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消磨时间和睡觉。有几天，在印度洋遇上了大风暴。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宏大的邮船尤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海水中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都要吐出来了。邮船到了各地大海港，都要停上两三天，装卸货物、煤炭和水等东西，有钱人便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学生就上岸去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管是高楼大厦，不少人穿西服革履，但也有许多人是破衣烂衫，沿街乞怜。有的客人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目睹这种情形，真使人心酸。我深深感到，世界上人们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是这样的不平。

经过四十来天的航海生活，途经香港、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科伦坡，渡过印度洋，到达红海，又通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塞得港稍停之后，进入地中海，最后终于到达了法国的马赛。

第二天我们来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生的欢迎，其中有在一年前就到法国的聂荣臻同志，异国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之感。在巴黎呆了不久，大部份同学分别到蒙达尼（或称蒙达时）、芳丹白露、圣得田、佛勒尔（或称阿恩）等地中学去学习或补习法文。大约在十月下旬，由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与二十七位同学一起到佛勒尔中学去补习法文，同时也在那里等待工作。过了四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即介绍我与胡大智、阙时杰三个同学，到法国沙农城由

施乃德尔资本家办的一个公私合营的机械厂当了学徒工。

机械厂的厂主虽然为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修建了宿舍，但只是非常简陋的木板棚。每个房间面积不过数十平方米，却要容纳二十多人，拥挤不堪，工人上下班又不一致，有人做饭，有人洗衣服，有人学习法文，所以根本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我与胡大智、阚时杰三人是一个伙食小组，每天下班回来就赶快用煤油炉子烧饭。那时，十天半月也吃不上一次荤菜，经常吃土豆、洋葱、萝卜等，加上用米粉煮的稀稀的粥作汤。工厂的劳动更是十分紧张艰苦，工头很凶，经常辱骂工人，甚至拳打脚踢。在这个工厂里，我才亲身体会到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我那时是下决心求学的，所以，不管再苦再累，都坚持晚上到工厂的职工夜校去学习两小时的技术课程，还抽时间（如星期天）自找老师补习法文。我拖着过度疲劳的身体工作、学习，在这里渡过了近一年的徒工生活。

到比利时上工科大学

一九二二年五月，我接到了聂荣臻同志从比利时沙洛瓦（现译为沙勒尔瓦，当时聂荣臻同志从法国到了比利时。）寄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沙洛瓦劳动大学用费低廉，正在建筑中国学生宿舍，免收住宿费，还为中国学生专门设有考大学的补习班。他建议我马上去那里补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我得了这消息，便立刻赶到比利时，找到了聂荣臻同志。我在他的建议下，暂时进入了这个大学附设的甲种职业学校。因为这里接触比国人多，学习法文方便。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补习，在这年暑假，都考上了劳动大学。荣臻同

志进了化学系，我进了机械系，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大学学生生涯。但荣臻同志在这里学习不久，于一九二三年夏又回到巴黎去了，我则一直学习了四年多，到一九二六年暑期毕业，获得了工程师文凭为止。

这所劳动大学是比利时社会党人创办的，教员中不少人是有名望的学者教授，或是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学校的规模虽不是很宏大，但设备较齐全，试验台很多，很实用，房舍建筑也很讲究。学校坐落在沙洛瓦城的最高处，外面有宽阔的广场，树木成荫，环境是很好的。由于沙洛瓦是比国的煤矿、电机电气工业中心之一，又有铁路直通到法德两国，交通很发达，劳动大学又名气，所以，布鲁塞尔一些工人家庭的子女每天早上坐一个小时的火车跑四、五十公里来上学。我们中国先后也有一百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学习过，其中有不少的勤工俭学生。学校里设有三个系，即机械系，包括动力、建筑、桥梁等专业；还有化工系与电机电气系。学制为四年，前两年学基础课，例如三角、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化学、力学、物理等等。后两年学专业课，我记得曾学过机械制造原理、材料力学、内燃机、外燃机（即蒸气机）等课程。

我与聂荣臻同志在这所大学里努力学习，精神上是丰富的，在物质上却是艰难的。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来源问题。我临出国的时候，亲友们这个送三元，那个赠五元，凑上了一百多元；经过勤工俭学生回国代表的奔走呼吁，得到当时中国政府，包括省、县政府的一些汇款救济，我也分得了一些，在考沙洛瓦劳动大学后，我还争取扬希仲先生济接了三百元（后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同他再没有

联系了)，还有在巴黎作工的好友的少许帮助；而主要收入则还是靠“勤工”劳动。我在沙农机械厂当学徒工的时候，拚命干活，节省开销，积蓄了一些钱。在上大学期间，每年放暑假三个月，我都去巴黎当临时工（事前托友人交涉好），以资补助。我还记得，一九二三年暑假时，我到巴黎同聂荣臻以及范一、陈家齐、何嗣昌等七、八人，租了一间较大房间，住在一起，白天分头去工厂做工。我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工，因没有技术，干了一些搬运，锯铁条、锤铁板等杂活。一九二四年暑假，我到巴黎雷诺汽车厂去当了两个多月分发工具的临时工。一九二五年我又到巴黎雷诺汽车厂作了三个月描画图纸的临时工。我通过做临时工，不仅维持了假期的生活费用，还积存了一笔钱留作学费。就是这样，对付了四年多的学习需要。当时，还有不少中国学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布鲁塞尔工艺学院、蒙斯大学、列日大学、根特大学等处学习。例如在列日大学就有黄土嘉、陈崇宪、万监周等中国同学。

思想的转变

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四年多，不仅奠定了我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的人生观。在这方面，聂荣臻、刘伯坚、黄土韬等同志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刚到沙洛瓦劳动大学时，聂荣臻同志和我同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屋。他在拚命攻读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还十分认真地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他经常给我讲学习体会，介绍苏俄劳农政府的政策，他认为我们中国也必须象

苏联那样，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劳动专政，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还经常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这都给我的思想以很大的启发，使我开始认真思索自己应当选择的政治道路问题。

同时，我到法国和比利时参加勤工俭学的痛苦实践，也给了我思想以很大的触动。特别是一九二一年留法勤工俭学史上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使我对中法两国反动政府产生了无比的愤慨。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实业救国”的思想是很流行的，我参加勤工俭学，就是想到西方学点科学技术，回国也搞实业，以便使祖国富强起来。但经过实践的检验，尤其是自己的亲身遭遇，已经说明，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只能是纯粹的幻想！

于是，我在聂荣臻，刘伯坚同志的影响下，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思想逐步地转向了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发动暴力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实行劳农专政，才能真正挽救祖国。在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一九二三年一月经聂荣臻（别名向上）、刘伯坚（别名大冶）两同志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别名红工），一九二五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比利时的党团活动和留比学生总会

一九二二年冬，赵世炎、周恩来同志把在欧洲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由于它的工作范

围是总支性质的，所以很多回忆录里都习惯称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当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出面，对外都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名义进行活动，党团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旅欧支部下辖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旅欧支部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所属的旅比支部，就设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起初的负责人是刘伯坚和聂荣臻同志，一九二三年夏，聂荣臻同志到巴黎去了；一九二四年刘伯坚、熊味根等同志到莫斯科去学习。他们走后，旅比支部的工作，就交由我负责。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做了两、三年团支部书记的工作（其间，别的同志也任过支书）。

旅比团支部的成员，除了刘伯坚、聂荣臻之外，还先后有熊味根、黄土韬、甘瑞、张贵元、乔丕成、乔丕显、黄土嘉、万监周、张熙、马光亨等二十多人。起先，我们团支部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探讨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每两周开一次讨论会。后来，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党团生活的内容也就越加接近实际了。

一九二三年夏天，在巴黎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我和乔丕成两人出席了大会。会议选举了周恩来（书记）、李富春（宣传委员）、尹宽（组织委员）傅钟、邓小平等同志组成书记局。这次大会上还决定把《少年》杂志改为《赤光》（这个决定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才付诸实施）。

一九二四年春天，在旅比团支部内部举行过追悼列宁逝世大会。籍此机会还吸收了一些进步青年入团，扩大了我们的队伍。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国共合作，成立统一战线，我们按照党中央给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在法、德、比国都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实际活动较少，到一九二五年间，就又分裂了。国民党在国内出了“山西会议派”，也影响到我们同国民党支部的团结。劳动大学前后的一百多名中国同学，其中有勤工俭学生，有俭学生、有国民党员、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社会民主党员和国家主义党员（俗称青年党），也有不参加党派活动不问政治的人，还有个别人参加了天主教的活动。有个天主教神甫，叫雷鸣远，曾在中国呆过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以给勤工俭学生介绍工作或募捐救济的名义，来拉拢一些人去信仰天主教。他的政治目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灾难”让“天主教”挽救中国，妄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当作洪水猛兽加以扑灭。他在布鲁塞尔设有“中国学生公教家庭”，组织受他欺骗的青年进行活动。例如李杞和我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同学贾岱等人，就陷入了他们的圈套。我们团支部曾派人同那些受骗的青年谈话、劝说，但实际成效不大。

那时，为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和在留比中国学生中吸收左倾青年，我们团支部还与国民党支部合作，召集在布鲁塞尔、列日、根特等地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代表到沙洛瓦城，举行会议，于一九二四年正式成立了留比学生总会，并选出了乔丕成同志为会长，我为书记。后来留比学生

总会始终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虽然学生总会会长有时是我们的人，有时是国民党员，但学生总会书记一直是我担任。所以实际上的领导权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

一九二四年，留比学生总会曾请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来沙洛瓦劳动大学视察时，向同学们作国内形势报告和哲学问题演讲；一九二五年，在布鲁塞尔以留比学生总会名义举行了近百人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暑假以后，开展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留比学生总会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对旅比支部的关怀

中共旅欧支部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从一九二三年春天起，曾陆续从留法、留德、留比的勤工俭学生中和华工中选派青年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

一九二三年三月中旬，周恩来同志为了送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十余同志第一批到东方大学去学习，从巴黎出发，到柏林去办理赴莫斯科的手续，当他途经沙洛瓦城（沙洛瓦城是由巴黎去柏林的必经之地），刘伯坚、熊味根、黄士潜和我到车站去迎接他们。记得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需要大批干部，现在到苏联进东方大学，这就开辟了一条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材的道路。我们那时都十分向往莫斯科，认为那是光明的所在，凡是信仰社会主义学说的人，无不想去身临其境。我当然羡慕他们，也想去。并表示了这个意思。恩来、世炎同志见我还年轻，便嘱咐我说，在劳动大学学习科学技术也是革命事业所需要

的，应当安心；但同时要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和注意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变化。这次在车站接触时间虽然短暂，但恩来同志给我留下了英姿勃勃，待人亲切的深刻印象。

从这次会见之后，恩来同志来往于巴黎和柏林之间途经沙洛瓦城时，有机会就到学校来看望我们，做报告，讲形势或检查布置党团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夏天，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将要回国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从柏林回巴黎路经沙洛瓦城时，到我们所在的劳动大学停留了两天，检查旅比支部的工作。那时，他没有住在中国学生宿舍，而是住在乔丕成同志原住过的房东家一间小屋子里，我当时和团支部委员乔丕成同等志向他作的汇报，最后，他应我们的要求，向大家做了两次报告。

首先，恩来同志向在劳动大学学习的数十名中国同学做了时事报告，报告会是由留比学生总会名义召集的。当时的同学虽然大多数是勤工俭学生，但是派别也不少，有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有国民党员，有国家主义派，有无政府主义派，有改良的社会主义派，还有国民党右派。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揭发了北洋军阀政府一味屈从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媚外辱国的事实。他说，我们在海外的同学要和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每个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中国青年的历史责任。当时同学中虽有不同的派别，各自的政见不一致，但却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恩来同志的极大敬佩。

另一次是请恩来同志向旅比支部的全体党团员作报告，他讲了关于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组织发展情况，讲了中共旅

欧总支部的发展趋势，向我们指示，要大力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扩大队伍，即“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这是我们的主要责任。恩来同志在分析了我国现状之后说，靠改良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实业救国”也只是幻想；革命势在必行，只有学习苏俄搞暴力革命，中国革命事业才能有光明的前景。恩来同志的讲话，就象一股奔腾的激流，冲击着我们的胸膛，震荡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身上充满了革命的力量。

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夏天，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发动了一个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并指示我们旅比支部进行配合，发动群众，展开斗争。

为什么要发动这个运动呢？我记得，由于当时国内大革命的风暴正席卷着南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以及上海、武汉、九江等地工人运动，都在蓬勃发展，形势很好。恰在那年，中比之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期满，但条约上规定，如要废约，必须两国政府双方批准同意。所以，为了配合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的到来，中共旅欧支部便组织力量竭力促成废除不平等条约迅速实现。

我记得，这一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比利时政府的，为了使比同意废约，一方面我们向比国同情我们的有关单位和开明人士，进行广泛的阐明工作，还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争取舆论的同情；另一方面，我们还直接向比利时外交部长汪尔德提出抗议，要求他的政府迅速批准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我们召集比国各大城市如列日、蒙斯、根特、安特卫普等

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工华侨，到比国首都布鲁塞尔向外交部、内务部等处进行示威，呼口号、散发传单。我们组织的这些活动，因为人数不多，声势不大，搞了数次效果都不明显。因此，我们决定，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末，把侨居在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各国的中国人，尽可能多地集中在布鲁塞尔，搞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驻比公使馆暗中支持）。

结果，中共旅法支部的熊禹九、温大同，中共旅德支部的潘芳、王德宣、朱建邦，中共旅比支部的毛克生和我等都参加了。我是以留比学生总部书记的名义同留比学生总会会长邓矩芳一起在暑假中去布鲁塞尔参加的。此外，经过联络动员，还有驻在荷兰的中国海员数十人，侨居英国伦敦，奥地利的中国人也派了代表。这样就发动了一次数百人参加的规模较大的游行示威。

在游行示威那天，我们举着标语牌，故意在大街中央前进，潘芳等人还带头在电车道上卧轨，使交通阻塞；行人聚集，扩大事态，以便我们好向国内外发通电，造成舆论，给比国政府施加压力。果然，当游行队伍到达布鲁塞尔闹市区的时候，比利时大批警察一齐出动干涉，与我们互相扭打起来，最后竟将我们三、四十名同学关进牢房，并于当天晚上把其中的小部份人驱逐出境。事情既然闹大了，我们就通电全欧洲和国内，还要求中国驻比利时公使王京岐，向比利时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申明要降旗回国等项条件。

经过这次声势较大的斗争，终于使比利时政府被迫同意释放在押学生，并表示答应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从而使这一运动以我们最后胜利而结束。这场斗争是有意义的。它的

我对江津中学母校的回忆

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团员

王祖陶

天津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是江津县先锋乡人，1936—1939年在江津中学上学，当时只有初中部，还没有高中部。我入校的年龄是十二岁至十五岁。毕业后我考取了设在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从此就离开了江津故乡。以后又在南开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上学，毕业后留在南开大学任教三十年，目前在天津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工作和任教。我离开故乡到北方以后，除1950年曾回乡探亲一次外，三十多年没有再归故里。1984年6月我应四川大学的邀请，前来成都讲学并主持一项科技成果的鉴定会，才得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江津看一看。万里游子回乡，心情是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当我回到江津县城的那一天，大雨滂沱，首先想要看望的地方就是那教育我成长并使我初步获得科学基础知识的江津中学。我冒着倾盆大雨先到了高中部，向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同志打听三十年代我的老师的情况，得知龚琢章、刁迺衡等老师都已作古，目前在校任教的老师没有认识的。我还打听一些老同学的下落，是否还有在县城工作的，当然都没有结果。但是我想重睹母校丰采的愿望却是那样的强烈，不管有没有熟人，自我介绍一下，在校园内走走看看总是可能的。即使这样一点愿望得到满足，我这游子之心也就得到最大的慰藉了。我信步来到黄荆街江津中学的旧址，见到一位老师模样的同志，走上前

去打听，果然是老师，他一听我的介绍，便马上热情同我交谈起来。我急切地向他询问了一些老师和老同学的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了学校的近况，最后带领我参观了校园。除了房舍整修一新，增建了烈士纪念碑外，一切如故。古典式的校门建筑装饰，典雅庄重，走进校门，一面白色墙垣顺直延伸向里，显得幽深宁静，有着悠久历史的学府风姿，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多少年来，它的特有的风姿，一直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

参观后我就赶回先锋老家了。回乡后我意外地见到了林风栖老师的弟弟，才知道林老师现在江津中学任教，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过去的老同学很多，我向那位陌生的老师打听情况的时候，一直没有想起林老师来，也就错过了拜访林老师的机会。我在先锋老家住了三天，就匆匆回到江津县城，直接拜访了林风栖老师。他是我在先锋乡小学的同学，后来又是在江津中学的同窗学友，他在四十六班学习，我在四十七班学习，他是我的学长。我们两人将近有半个世纪没有见面了，虽然都添了不少白发，但是音容笑貌依旧，大家见面很快就认出来了，自然都感到很激动。林夫人热情地下厨备酒小酌，林老师还邀请了校长、党支部书记和当年四十八班的一位老同学作陪，共席叙谈，倍感欢欣。饭后又在当年我上课的教室和自习室前的四合院里合影留念，这几张照片我一直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保存着。江津中学领导和林老师还嘱我给母校题辞留念，我思考了一下，就把我这次回四川旅游峨眉山等名胜古迹后所作的一首诗当作题辞。我一直从事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作诗是外行。我有一点旧体诗词的基本知识，还要感谢当年母校教我国文的朱近之先生。现在把这首

诗抄录如下：

物华号天府，西岳兼地灵。

诗书醒人杰，世代传龙人。（注：喻龙的传人）。

我在没有转入回忆母校的正题之前，先写了我重访母校的回忆，首先表达了我对母校的无限思念，及母校在我心中不可磨灭的形象，这就当作我这篇回忆的前言吧！

江津县治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秦汉。但在近代史上，我认为江津县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就是兴办了两所闻名全川的中学：江津中学和聚奎中学。一个县竟然兴办了两所有名的中学，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我们都认识到教育是基础的重要意义，本世纪以来，江津县就是因为有了比较好的教育基础，所以文化绵延，文风鼎盛，培育了不少杰出优秀的人才。聂帅是最杰出的代表；吴芳吉先生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家；解放前国内经济学界盛称有“江津三杰”，就是杨西孟、罗志如、樊弘三位著名教授。现在，在技术革命的新时代，为了适应我国城乡经济大变革形势的发展，我更希望我的故乡多渠道、多层次地再兴办一批学校，包括兴办大学教育在内。

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回忆的是江津中学优良的学风，首先是严谨的学风。当时考取江津中学是比较难的，入学考试水平高，考上了是很大的荣誉，在乡里亲友中青眼相看，称赞你学习好，有出息。江津中学的任课教师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许多人是国内著名的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在教学上要求很严格。作业必须按时完成，计成绩，迟交或不交作业，老师一点不客气，就在课堂上点名挨训斥。写作业的格式也严格要求，不合规格也要挨训斥。当时的校长是傅成霖先生，亲自